

# 《德意志意识形态》经典文本映照下新质生产力的当代价值与发展路径探析

何牵千

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 2026年4月6日; 录用日期: 2026年4月26日; 发布日期: 2026年5月11日

## 摘要

生产力概念是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的基石, 生产力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本文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为理论基础, 深入剖析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渊源与当代意蕴。《形态》基于“现实的人”、“物质生活的生产”及“交往活动”构建的生产力思想范式, 为理解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坚实的学理支撑。新质生产力与《形态》存在思想共鸣: “现实的个人”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前提, 二者相互促进; 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推动着生产关系的适应性变革; “生活决定意识”的唯物史观原则揭示了新质生产力生成的历史必然性与社会先进力量的历史主动性的统一, 新质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实现共产主义的核心物质前提。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 发展新质生产力应坚持科技创新与文化融合, 营造良好创新生态; 通过制度创新构建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以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推进强化智力支撑; 并通过广泛的社会协作与普遍交往拓展发展空间, 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动力。

## 关键词

《德意志意识形态》, 新质生产力, 生产力, 发展

## An Analysis of the Contemporary Value and Development Path of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Light of the Classic Text of *The German Ideology*

Qianqian He

School of Marxism,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productive forces is the cornerstone of Marx and Engel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the theory of productive forces constitutes the foundation of the Marxist theoretical system. Based on *The German Ideology*, 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s the theoretical origin and contemporary implic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e paradigm of productive forces constructed in *The German Ideology* on the basis of "real individuals", "the production of material life" and "intercourse" provides solid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understand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ere is an ideological resonance betwee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The German Ideology*: "real individuals" are the premis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the two promote each other; the contradictory movement between productive forces and forms of intercourse drives the adaptive transformation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t principle that "life determines consciousness" reveals the unity of the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of the emergence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the progressive social forces of historical initiative. The high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s the core material prerequisite for the realization of communism. Faced with the new roun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hallenge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should adhere to the integr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culture to foster a sound innovation ecosystem; build new types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compatible with them through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strengthen intellectual support by promoting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alent; and expand development space through extensive social collaboration and universal intercourse, so as to provide a strong driving for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 Keywords

*The German Ideology*,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Productive Forces, Development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在当前全球科技竞争日趋激烈与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新质生产力正逐步成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2023年9月，“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被首次提出，并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1]”这一重要论断，不仅深刻揭示了新质生产力的丰富内涵与核心特征，也为我们理解和把握当代生产力发展的新趋势提供了重要指引。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出发，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它不仅体现了生产力随着时代进步而不断发展的新趋势，更在多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进行了创新和发展。本文以《形态》中架构起“生产力”思想的重重理论范式为理论基础，通过对这些理论范式的细致梳理与深入分析，探寻其与新质生产

力的内在联系，进而深入揭示新质生产力在当代社会的重要价值以及未来的发展路径。这一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理解与认识，推动我国经济在新时代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

## 2. 《形态》中架构起“生产力”思想的重重理论范式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超越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哲学，通过确立“现实的人”、“物质生活的生产”以及“交往活动”三重核心范式，奠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基础，也为理解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完整的分析框架。

### (一) 现实的人是生产力形成与发展的逻辑起点

由于“生产力”是唯物史观得以创立的前提和基础，作为生产力要素中的现实的人也必然是生产力发展的前提和出发点。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为将人们从幻想、想像、观念和教条的枷锁和束缚下解放出来，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布鲁诺·鲍威尔和麦克斯·施蒂纳等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要代表主张通过“教会”的方式使人们“代替”“批判地对待”或“抛掉”这些幻想和想像。与此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则认为，这种陷于思辨的自我意识中，囿于意识形态自身的“解放”，“青年黑格尔派要把他们从中解放出来”之路，是天真的、幼稚的空想。尽管德意志意识形态家都断言自己已经超越了黑格尔哲学，自以为是使世界消除灾难的绝对救世主，但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家的批判内容可见，他们依然是在黑格尔哲学的基地上转圈子，从没有离开过这一基地。对此，他们好像不自知，更没有思考过“自己的一般哲学前提[2]”。“从施特劳斯到施蒂纳的整个德国哲学批判都局限于对神学观念的批判。与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不同，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只局限于纯粹的思想意识领域，只是通过一些“思想”反对另一些“思想”的方式，只同意识的幻想和想像进行斗争，难以把握哲学与现实的真实关系，以如此方式回答问题甚至问题本身都必然包含着神秘主义。为此，哲学与现实的联系问题、哲学批判和批判者的物质环境的联系问题必然不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家的思想视野之内。由此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中开始触及现实的问题。摆脱幻想和想像，走入现实的物质生活环境，马克思开始思考人类社会历史的现实前提是现实的个人。它理解的人不是像费尔巴哈的“自然人”、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孔德的“实证人”，不是纯粹的和抽象的人，也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居所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个人，”更不是游离于既有的历史条件 and 生产关系之外的个人[3]。这样的个人，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4]”。马克思这里所说的“有生命的个人”指的是现实的个人，即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个人。从而论证出“有生命的个体存在”是生产力形成得以可能的“第一个前提”，这一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抽象的教条，而是通过实证经验可以明确指认纯粹经验方法可以确认的。没有现实的个人，生产力思想无法获得深刻的理解，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到变革，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更无从谈起。由上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中确立的现实的个人是生产力形成得以发展的前提和出发点，这是唯物史观创立过程中的理论贡献。

### (二) 物质生活的生产是生产力理论的真正发源地

生产力是人类改造自然并从自然界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物质资料的能力。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在以往的西方哲学家中，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等都关注到了人类的实践活动，但他们的实践活动主要停留在政治活动或伦理道德活动。与这些哲学家关注实践活动不同，马克思认为实践活动是指改造世界的物质性活动，主要是以生产力劳动作为代表。在物质生产劳动基础之上，人们的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不断衍生。马克思在《形态》中还强调：“我们应首先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必须能够进行物质生产。[5]”马克思认为，人自诞生以来进行的第一个活动就是满足自身的温饱，即衣、食、住等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生产力理论是在人们对物质生

活生产实践不断总结和研究的基礎上发展起来的，它反映了人们对物质生产过程中人与自然关系、人与人关系等诸多问题的思考成果。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进行一切活动的首要前提，一个社会的结构、性质和面貌也是由当时社会的物质生产活动及生产方式决定的。依此分析，生产力理论不是自发生成的，而是源于物质生产活动，物质生活需要。

人们为获取生活资料而进行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得以在地球上存活的第一前提，若没有这一前提，人类历史也无从谈起，根据这“第一前提”也可以将人类和动物区别开来。不难理解，整个人类历史之所以能延续至今，不间断的物质生产活动和感性活动是真正的基础。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之于民族、国家的存在必然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和意义。历史越向前追溯，这一理论的真理性越强。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已经不仅认识到，各种自然条件对于人的肉体组织、种族差别的决定性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也较为充分地认识到物质生产活动和感性活动对于“人之为人”、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的制约甚至决定作用。物质生产的中断不仅使得整个自然界，而且会使整体人类世界、人类历史和人自身都会很快消亡。这即阐明物质生活生产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自身的存在论价值。由此分析，马克思恩格斯的阐发已经展示出清晰的唯物史观进路。倘若中断了物质生活生产，生产力理论则难以形成并发展，人类历史则难以为继。

### （三）交往活动成为生产力发展的社会表现形式

在《形态》中，“交往”“交往形式”“物质交往”“精神交往”“普遍交往”等概念构成了特定理论范式。由文本清晰可见，这些范式不是孤立存在的，单独出场的，而是与生产力、生产关系、分工、解放、社会制度和世界历史等概念和场景相互交织呈现。从中可清晰洞察到，生产力的进步依赖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动，且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也驱动着人们的交往实践。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 p. 126)”基于此，马克思认为人是社会性的“类”存在物，以类的方式存在是人的存在和发展之必要和必需。在以类的方式活动中，必然会形成一定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从哲学层面看，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社会性动物，存在于社会关系之中，交往活动是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本形式。新质生产力作为人类改造自然与社会能力提升的标志，深刻地嵌入在人类交往实践的网络之中。一方面，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交往活动是主体间性的彰显，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正是多元主体在交往互动中实现价值共创的过程。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又会反作用交往活动，拓展交往的广度与深度，促使交往方式更加智能化、多元化，进一步丰富人类社会关系的内涵，两者在相互作用中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在探讨新质生产力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联时，能够发现新质生产力具有全球性意义，既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在中国与世界相互依存的格局下，于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时代浪潮中，新质生产力成为践行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理念，达成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目标，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路径。

## 3. 《形态》经典文本映照下新质生产力的思想共振

在深入探究《形态》里新质生产力思想的进程中，除了借助对现实的人、物质生活的生产以及交往活动这三重理论范式的阐释路径与呈现形式外，借助具有代表性的“经典文本”加以映照剖析，同样是深刻领会并精准把握新质生产力思想的关键手段。相较而言，凭借“经典文本”来深入理解这一思想的方式更具关键意义，它能够更为深入地触及问题的核心与内在本质，从而为全面透彻地理解新质生产力思想筑牢根基、指明方向。

### （一）历史的前提是现实的个人、他们的活动、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

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现实的个人”构成了历史演进的根本前提。正如马克思在《形

态》中所强调的，唯物史观的出发点乃是处于特定历史情境与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的现实个体。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是，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5], p. 527)。从历史发展的宏观脉络来看，新质生产力作为人类社会进步历程中的关键环节，其孕育与发展同样以“现实的个人”为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马克思与恩格斯所界定的“现实的个人”，马克思恩格斯讲的“现实的个人”，其现实性就在于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条件。“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6]”在马克思看来，其本质特性体现于他们的实践活动以及与之紧密相连的物质生活条件。这些个体并非脱离现实世界的抽象存在，而是积极投身于物质生产实践的主体力量。作为自然生命体，人必须通过物质生产实践从自然界获取生存所需的物质资料，而在此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得以逐步构建并不断演变。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实践过程对于人的能力提升具有极为关键的推动作用，进而为新质生产力的萌发与成长提供了内在动力源泉。

在当今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背景之下，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已然成为时代的显著特征。“现实的个人”在这一进程中占据着生产力要素主体的核心地位，他们以新型劳动者的身份成为推动新质生产力从理念构想转化为现实成果的决定性力量。无论是前沿科技领域的创新突破，还是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重组与优化配置，亦或是传统产业向纵深维度的转型升级，无一不依赖于“现实的个人”的积极参与和不懈努力。深入探究“现实的个人”与新质生产力之间的关系，不难发现二者呈现出一种紧密交织的辩证统一格局。一方面，新质生产力对“现实的个人”的全面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积极影响。一是从劳动效率与生活品质的维度审视，新质生产力凭借持续的技术创新举措，实现了劳动生产率的大幅跃升，有效减轻了劳动者的体力负担，优化了劳动环境，并且显著缩短了劳动时间。二是在职业发展空间拓展方面，新质生产力的蓬勃兴起催生出一系列新兴职业，如人工智能工程技术人员等，为个体提供了更为丰富多元的职业选择机会与广阔的发展平台。与此同时，传统产业在转型升级的进程中对从业者的专业知识与技能提出了更为严苛的要求，这无疑促使个体不断追求知识更新与技能提升，进而推动其在职业道路上持续迈进。三是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还在满足消费需求层面展现出强大的变革力量。它驱动制造业加速向智能化、服务化、绿色化方向转型，从而能够为社会提供更为优质、多样化且贴合高端需求的产品与服务。以智能家居产品为例，其广泛应用极大地提升了人们的生活便捷性与舒适度，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体验。四是从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宏观视角来看，新质生产力借助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打破了地域限制，强化了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动交流。个体能够依据自身独特的需求与兴趣偏好，便捷地获取定制化的产品、服务以及教育资源，从而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另一方面，“现实的个人”的素质提升构成了新质生产力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与强劲动力。一是在知识技能更新层面，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态势对劳动者的综合素质提出了全新的、更高的标准与要求。劳动者不仅需要熟练掌握现代先进技术，能够高效精准地操作高端复杂设备，还必须具备快速学习新知识、适应新技术变革的能力。唯有通过持续不断地提升自身知识技能水平，劳动者才能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浪潮中保持适应性与竞争力。二是创新能力的培育对于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核心关键意义。“现实的个人”作为创新的主体力量，其创新思维与能力的不断锤炼与提升能够为新质生产力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与创造力。在实践中，个体通过积极探索与尝试，提出新颖的理念、方法与技术，从而为新质生产力的突破性发展开辟新的路径与可能。最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往往涉及多个领域、多种专业的协同合作，这就要求“现实的个人”具备强烈的协作精神。个体需要积极主动地融入团队协作体系之中，与其他成员展开密切有效的沟通交流，充分汇聚各方优势资源，共同攻克技术难题与发展瓶颈，实现新质生产力在协同创新模式下的稳健发展。综上所述，“现实的个人”与新质生产力之间相互依存、相互

促进的辩证统一关系，在当代社会发展进程中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深入理解并把握这一关系，有助于我们更为精准地把握历史发展规律，为推动社会经济的持续进步与人类的全面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

## （二）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

在历史的长河中，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深刻地塑造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提出的“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这一经典论断，为我们揭开了历史演进奥秘的一角。生产力概念是马克思恩格斯构建其唯物史观的基石性概念，生产力理论是马克思主理论体系中的基础性理论。生产力，作为人类改造自然以获取物质资料的能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各异的内涵与形态。从远古的石器时代，到农耕文明的青铜与铁器，再到工业革命后的机器大生产，直至当下以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崛起，其发展历程见证了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而交往形式，即生产关系，则是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所结成的社会关系，它与生产力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当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相适配时，社会呈现出相对稳定与繁荣的景象。然而，生产力并非静止不变，它具有内在的革命性与发展性。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者社会状况”，决定着人们的物质交往关系，而一定的物质交往关系和交往形式又反过来制约生产力的发展方式、规模和范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原来与生产力相适应的交往形式便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从而由新的交往形式来代替([5], p. 519)。

当下，随着科技的突破与创新，新质生产力逐渐展现出创新性、高科技含量、高效能与高质量等特征，使其与传统的交往形式产生了日益尖锐的矛盾。以新质生产力所依托的数字经济为例，其在全球范围内的迅猛发展，极大地改变了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的模式。但现有的部分交往形式，如某些滞后的法律法规、传统的行业监管模式以及僵化的企业组织架构等，已难以满足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求。这种不匹配导致了诸多矛盾的滋生，如数据产权的界定不清引发企业间的竞争纠纷，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在资源分配与发展理念上的分歧等。这些矛盾冲突的根源，正是新质生产力代表的先进生产力要求与旧有交往形式之间的张力。

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马克思所提出的“两个决不会”思想与《形态》中的“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思想上是完全相承的。“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3], p. 3)。马克思认为，任何一个社会形态都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形态更替的根本动力，但同时也受到既有生产关系的制约。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只要是在物质存在条件已经成熟的条件下，与这种物质条件相适应的社会形态就会产生，“物质存在条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生产力。在这两大条件中，物质生产力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两个决不会”思想也就给予了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理性自觉与理论自信。马克思将社会形态的演进置于世界历史的整体视野下，分析了旧的社会形态的灭亡条件和新的生产关系产生的条件。新质生产力的萌发与成长，正推动着社会生产力向新的质变临界点迈进，这必然会引发生产关系的相应变革。在迈向更高阶段文明形态的社会实践中，新质生产力的出现具有特殊的意义与价值。它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在当代的创新发展，也是适应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必然产物。新质生产力出场于适配先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制度框架之下，与新型生产关系存在着天然的契合性与适应性。通过秉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我们能够积极引导新质生产力的健康发展，化解其与旧有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冲突，从而为全面建设现代文明形态奠定坚实的物质与制度基石，推动人类社会向着更高阶段的文明不断演进。

## （三）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这是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根本区别([4], p. 23)。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社会实践，而是从社会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5], p. 556)。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纵深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从当代国情中应运而生，从社会实践出发来发展新的生产力。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重申：“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是历史观上的伟大变革。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以内涵式发展为主要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是对传统生产力的反映[7]。社会意识内生于社会存在，新质生产力也是人民对社会存在变化的自觉把握，深化了对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发展新质生产力也就彰显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统一关系。

### **1. 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生产力的发展需要适应新的社会需求，从而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

首先，中国社会进入科技进步“加速度”时代，新一轮科技革命给世界各国带来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中国也迎来了依靠科技创新完成发展动力变革的历史机遇。当前的科技之变涌现出一批新兴技术和颠覆性技术，例如纳米技术、无人驾驶、超级高铁、大语言模型等等[8]，这些科技成果将对知识技术体系和生产组织方式产生重大影响。具体而言，生产的自动化和智能化程度大幅提升，人工智能的创造力得到增强，机器由单一的执行工具转变为自主创新的载体，社会生产力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比例将发生新的调整，人类也将进入体力和脑力“双革命”的时代，推动生产力的爆发式飞跃。因此，由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塑造的新型生产力形态也就呼之欲出，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也就成为因势利导的科学研判。

其次，中国经济发展处于速度换挡、结构调整、动力转换的重要节点，生产力呈现出不平衡发展和不充分发展的两类发展难题。生产力的两类发展问题具有不同的性质，生产力的不平衡发展表现为不同领域之间发展失衡和经济结构发展不协调，如城乡和区域之间的生产力发展不平衡、不同行业和领域的生产力水平不均衡、生产力的总量增加和民生改善不平衡等问题。而生产力的不充分发展表明在若干领域还存在发展不足的问题，很多经济增长点还没有被充分释放出来，在关键行业存在短板、弱项和“卡脖子”现象，体现出发展的任务仍然很重。但同时，生产力不平衡发展和不充分发展的两类发展难题是相伴而生的，二者具有内在统一性。生产力的不平衡和不充分发展相互交织，不平衡体现不充分，不充分蕴含不平衡，这就需要能够实现既平衡又充分的生产力发展模式予以解决，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也就成为遵循客观现实的必由之路。

### **2. 以社会意识的能动性为依据，主动应变催生新质生产力**

首先，历史主体的能动作用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根本支撑。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国际科技竞争空前激烈的情况下，这一生产力已经上升到“能不能生存和发展的高度”。新质生产力形成也更加依靠原创性技术的突破和科研成果的加速转化。其次，新质生产力不仅取决于技术的更新迭代，还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消除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因此，催生新质生产力需要自觉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激发社会生产力发展活力，破解生产力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难题。

### **(四) 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

生产力发展促进人们的普遍交往，而普遍交往又反过来推动生产力的矛盾运动。在《形态》中，马克思与恩格斯着重强调，共产主义的达成需以生产力的大幅增长以及交往的广泛拓展为根基。倘若生产力未能得到充分发展，那么共产主义将陷入贫困的泥沼，甚至导致极端贫困的蔓延。一旦处于极度贫困的境地，人们便会被迫重新投入争取基本生活必需品的苦战之中，往昔那些腐朽落后的事物亦将卷土重来。与此同时，马克思与恩格斯还指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

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5], p. 527)。”这表明，共产主义并非局限于某一地域，而是具备世界历史性的宏大事业。与之相应，新质生产力也具有全球性的意义与价值，中国的新质生产力发展受益于世界，而世界的整体发展也离不开中国在这一方面的贡献。步入 21 世纪的崭新征程，生产力呈现出新的形态特征，以创新为引领核心，超脱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与生产力发展路径，彰显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特质，与新发展理念深度融合的这种先进生产力质态，无疑是实现共产主义的核心前提与关键支撑。实现共产主义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崇高追求与长远蓝图，发展新质生产力在这一伟大历程中承载着极为关键的前提性意义以及契合时代需求的重要价值。其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实现共产主义的核心历史前提之一。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共产主义社会建立在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基础之上，这要求生产力达到极高水平，能够充分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物质文化需求。传统生产力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其发展逐渐面临瓶颈。新质生产力则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等显著特征，能够突破传统生产力的局限，创造出更为丰富的物质财富。其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有助于推动社会分工的高度合理化与融合化，这也是实现共产主义的重要前提。共产主义社会追求人的全面发展，摒弃了旧式分工所带来的人的片面发展与异化。新质生产力的出现，尤其是智能化、自动化技术在生产领域的广泛应用，促使传统的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界限逐渐模糊，生产过程中的各个环节更加紧密地协同合作。这种趋势有利于打破行业壁垒与职业隔阂，使人们能够在不同的生产领域和社会活动中自由切换，从而实现自身能力的全面提升与个性的充分发展。其三，实现共产主义还需要建立在全球生产力均衡发展与合作的历史前提之上。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都无法孤立地实现共产主义。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全球性的扩散效应与联动效应，它能够通过技术创新的传播与共享，带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生产力水平共同提升。当全球范围内的生产力实现相对均衡与广泛合作时，人类社会将更接近共产主义所倡导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理想境界。最后，新质生产力的壮大必然对生产关系变革提出了新诉求并注入变革动力，这与共产主义实现所需的生产关系变革相契合。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原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分配方式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等都将面临调整与变革。综上所述，新质生产力作为当代生产力发展的前沿力量，在推动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它通过促进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社会分工的合理化与融合化、全球生产力的均衡发展以及生产关系的适应性变革等多方面，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前提基础，是向着共产主义宏伟目标前行的核心动力源泉。

#### 4.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路径

##### (一) 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新质生产力

马克思在《形态》中着重指出了生产力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意义，在当下全球化与数字化迅猛发展的时代，创新已然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核心动力。科技创新作为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的关键因素，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而推进文化与科技的深度融合，契合催生新质生产力的创新要求，能为其创造有利环境，推动产业创新，加速绿色生产力的发展，对于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深远意义。

##### 1. 文化和科技融合为科技创新创造良好环境。

首先，文化和科技融合打破了传统单一学科的限制，为科技创新提供了丰富创意源泉。例如，在电影制作中，将文学的叙事手法、艺术的审美观念与先进的影视特效技术相结合，创造出如《哪吒之魔童降世》等具有跨学科魅力和震撼视觉效果的作品，激发了科技在影视特效领域的颠覆性创新，为相关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其次，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作为庞大的创新领域，其文化交流与差异产生的市场需求，促使科技创新成为原创性引领者。随着全球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人们对不同语言的学习和

交流需求增加，这就迫使科技企业研发出如智能翻译软件等创新产品，以满足人们动态变化的文化交流需求，推动了语言识别与翻译技术的不断进步。再者，文化和科技融合变革传统教育教学方式，培养复合型跨界创新人才。最后，文化所塑造的价值观和伦理规范引导科技创新的正确方向。比如在人工智能的发展中，文化所蕴含的尊重个人、保护隐私等价值观，促使科研人员在研发过程中注重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避免人工智能技术被滥用，确保其符合社会利益和道德标准，从而保障了新质生产力在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发展。

## 2. 文化与科技融合驱动产业创新升级

首先，文化与科技融合以数字化重塑传统产业，激活存量生产力。文化和科技融合借助数字化转型的浪潮，深度渗透至传统产业内部，如出版、音乐、电影等领域，实现了全方位的革新。以音乐为例，音乐产业因数字音乐平台的崛起，从传统唱片销售模式转变为线上付费下载、流媒体播放等多元盈利模式，降低了音乐制作与传播成本，让小众音乐作品也有机会获得全球听众。电影产业同样如此，数字化拍摄、特效制作及线上发行放映等环节，让电影制作周期大幅缩短、成本降低，同时借助网络平台的全球传播，收获更广泛的票房与周边收益。此外，文化遗产与旅游资源借助数字化技术实现了信息化传播与虚拟展示，如敦煌石窟的数字展览，让全球游客能够足不出户领略其艺术魅力，也为实地旅游增添了更多文化内涵与吸引力，为传统文化旅游产业注入新的活力与商机，使传统产业在存量基础上释放出更大的生产力。其次，文化与科技融合催生新兴业态，创造全新经济增长点。文化和科技融合大力促进了内容与技术的深度集成以及平台工具的创新构建。各类丰富的文化资源借助内容聚合平台、社交媒体、在线直播等新兴数字化平台，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整合、展示与便捷访问。例如，在线教育平台整合了全球优质教育资源，打破了时空限制，使学生能够随时随地接受个性化教育课程，创造了教育领域的新商业模式与经济增长点。数字出版平台让作者能够自助出版作品并直接面向读者销售，改变了传统出版产业链结构，并开辟了新的盈利途径。数字文博借助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技术让文物“活起来”，吸引了大量观众线上线下参观游览，带动了文博产业的数字化创新发展。智能娱乐领域，如互动式游戏、沉浸式戏剧等，融合了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为消费者提供了全新的娱乐体验并创造了高额经济价值。虚拟现实体验中心更是让消费者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各种虚拟场景，从虚拟旅游到虚拟演唱会等，成为新兴娱乐消费热点，这些新兴业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极大地丰富了经济产业形态并创造了可观的新增经济效益。

## 3. 文化与科技融合是新质生产力绿色发展的加速器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正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关键力量，其中绿色生产力更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内涵与重要表征。世界各地的文化传统中都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东方哲学和文化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道家所倡导的“天人合一”思想以及儒家“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理念，深刻反映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与绿色发展方式内在共通的价值追求。这些文化理念为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绿色生产力提供了深厚的思想根基与价值导向。在物质财富利用层面，文化和科技融合深刻变革着产品的设计、生产流程及其运营使用模式，使其朝着更加节能低碳环保的方向发展[9]。例如，精细农业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如物联网、大数据与智能传感器等，精准监测土壤肥力、作物生长状况以及气象条件等信息，实现精准灌溉、施肥与病虫害防治，极大减少了农业资源的浪费与化学药剂的使用，既提高了农产品的产量与质量，又降低了农业生产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同时还赋予了农业生产过程丰富的文化内涵。如传统建筑风格、民间艺术图案等，使建筑成为传承和弘扬地域文化的载体，增强了城乡的生态功能与文化底蕴。在精神文化生活层面，消费与生产相互作用的关系在文化和科技融合推动绿色生产力发展过程中得到充分体现。当前，消费拉动效应对碳排放增长的结构影响愈发显著，因此，推动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对于形成稳定的绿色生产方式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文化和科技融合通过教育与媒体宣传的力量，积极倡导

简约适度的生活方式。例如，借助数字媒体平台制作并传播绿色生活科普短视频、公益广告等内容，向公众普及绿色消费知识与环保理念，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与绿色消费认知水平。同时，依托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数字技术打造的沉浸式体验项目，让公众身临其境地感受生态破坏的严重性以及绿色生活的美好，从而激发公众内心深处的环保情感与绿色消费意愿，帮助公众培养绿色消费习惯和行为模式，为新质生产力在绿色发展维度上的提升提供坚实保障与强劲动力。

## (二) 适配新质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变革

在《形态》所阐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关系的理论框架下，新质生产力的蓬勃兴起必然呼唤着生产关系的适应性变革。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出发，着眼于变革旧的生产关系，即破除那些对生产力发展形成桎梏的管理体制与传统模式，是制度自我革新、自我升华的关键所在，其核心目的在于发展先进生产力，为生产力的跃升开辟广阔通途。而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宏伟征程中，需要构建与之相匹配的新型生产关系[10]，促使一切有利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经济要素涌现。制度创新作为驱动适配新质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变革的核心动力，在这一深刻变革进程中占据着极为关键的地位，其根本依托则是增强系统引领力。

增强系统引领力。从生产关系变革角度看，生产工具的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的显性标志，会直接引发社会分工状况的变化。正如《德意志意识形态》所指出：“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生产工具的发展作为生产力发展的显性标志，直接推动了社会分工状况的演变。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劳动者内部逐渐分化，不稳定的雇佣方式逐渐替代了原有的长期雇佣模式，导致低技能劳动者面临就业不稳定和收入受影响的困境。在此背景下，必须增强系统引领力。凭借强大的行政资源和政策工具，积极构建有利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制度环境。一方面，通过完善再分配制度，建立全国统筹的社保机制和数据库，破除非正式性劳动者参保的瓶颈。全国社保数据库的构建，能让劳动者突破地域、户籍和身份的限制，自由参保并享受应得福利。另一方面，进一步完善税收等再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加大对初次分配结果的调节力度，弥补其不足。对于低技能劳动者这一重点帮扶人群，应加大转移支付，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切实减轻困难家庭的负担。

## (三) 人才培养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智力支撑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创新人才是连接教育与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桥梁和纽带，大力培育创新性人才是建设教育强国和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必由之路。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创新人才的有力支持和积极推动，而高质量的教育体系则是创新人才培育和输送的重要源泉。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视角审视，教育作为一种关键的社会意识培养途径，对于创新人才的塑造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一方面，优化创新性人才培养体系，必须以高等教育为引领。一方面，优化高校教育结构，加速科技创新布局。一是着重提升服务于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的人才培养质量，从而充分满足新质生产力发展对创新型人才的迫切需求。二是调整高校学科设置，打破传统学科的藩篱，构建跨学科的核心课程，激励学生在不同学科间灵活穿梭学习，使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时能够自如地融合跨学科的知识与技能，以此充分满足新质生产力发展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三是鼓励高校与企业、科研院所紧密携手，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创新产学研一体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充分满足新质生产力发展对实践型人才的需求。另一方面，必须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性作用。人民群众是物质资料生产的创造者，构成了社会历史“剧作者”与“剧中人”的统一体[11]。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群众给历史规定了它的‘任务’和它的‘活动’。”人民群众的总体意愿和行动决定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方向，有力地推动着生产力向更高级的形态演进。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彰显了鲜明的人民立场，构建起为绝大多数人谋福祉的科学理论。劳动人民是价值创造的主体，广大群众通过辛勤劳动创造价值，

驱动着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变革。社会先进力量始终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以生产资料公有制确立人民群众在生产关系中的主体地位，激发了社会创造的蓬勃活力。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作为经济转型发展的必然要求，更需要充分释放蕴藏在人民之中的创造伟力。这就需要进一步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转化为切实有效的行动，在实践过程中运用辩证思维妥善处理人民的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服务群众与教育群众的关系，持续从人民的劳动创造中汲取发展智慧，形成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源泉。

#### (四) 营造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良好生态

《形态》中提出的“普遍交往”理论，为社会协作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普遍交往”强调打破地域、民族等限制，实现全面、广泛的交往。在这一理论下，社会协作成为营造新质生产力发展良好生态的关键。一是普遍交往促进知识与技术的传播。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依赖于创新知识和先进技术。不同地区、领域的主体通过广泛的社会协作实现普遍交往，能加速知识技术的流动。正如《形态》所言，交往使“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这使得创新成果能迅速扩散，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二是普遍交往拓展市场范围。新质生产力的成果需要广阔市场来实现价值。社会协作下的普遍交往打破市场壁垒，让产品和服务能在更大范围内流通。随着交往的深化，“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3], p. 169)，从而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创造更广阔的市场空间。三是普遍交往推动资源优化配置。社会协作能整合各方资源，依据《形态》中分工与交往的关系，合理的分工与广泛的交往能使资源流向最有效率的生产领域和主体。在社会主体层面，企业、科研机构、社会组织等应建立多元互动的合作机制。企业与科研机构共同开展技术攻关，国家为其提供政策和资金支持，社会组织则在促进科技普及、创新文化传播等方面发挥作用，共同营造有利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良好社会生态，促进新质生产力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广泛孕育和持续成长。

## 5. 结论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围绕现实的人、物质生活的生产以及交往活动构建的生产力思想理论范式，为理解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坚实理论基础。“现实的个人”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前提与核心，与新质生产力相互依存、促进，共同推动社会进步；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贯穿历史，新质生产力的兴起引发与旧有交往形式的冲突，同时也为生产关系变革提供动力，在当代社会形态演进的伟大实践中，有望实现良性发展；“生活决定意识”这一唯物史观原则([7], p. 83)，揭示了新质生产力是适应社会需求变化的必然产物，是对社会存在变化的自觉把握。在当代，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既是顺应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要求，也是解决中国经济发展难题的关键举措。我们应依据《形态》所蕴含的唯物史观智慧，把握新质生产力发展规律，推动其与生产关系协调共进，为全面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力量。

## 参考文献

- [1] 陈栋, 张亚强. 论新质生产力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双向奔赴”[J]. 湖南社会科学, 2026(1): 119-129.
- [2] 王洪波. 马克思恩格斯哲学历史观中社会关系规定的文本面向及当代审思——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经典论述为依据[J]. 教学与研究, 2024(7): 47-54.
-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153.
-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23.
-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19.
- [6] 马克思, 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0: 519.
- [7] 王德峰. 从“生活决定意识”看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的性质[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1): 35-41.
- [8] 陈旺静. 马克思全面生产理论的基本内容与当代价值——基于《德意志意识形态》[J]. 今古文创, 2023(15): 85-

87.

- [9] 周文, 白佳. 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机理、历史演进与理论创新[J]. 社会科学辑刊, 2024(6): 44-55.
- [10] 胡莹. 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基于《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的思考[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53(3): 22-32.
- [11] 陈威中. 唯物史观视域下新质生产力的三重逻辑[J]. 理论观察, 2025(10): 91-96.